

《外国文学作品导读丛书》之一

《红 与 黑》导读

郭 谦 编写

《外国文学作品导读丛书》之一

《红与黑》导读

郭 谦 编写

*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北京阜成门外花园村)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北京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75 字数：78千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7427.079

定价：0.75元

目 录

一、斯丹达尔的生平、创作、思想·····	(1)
二、关于《红与黑》·····	(10)
1、历史背景·····	(10)
2、从素材到作品·····	(12)
3、“红”与“黑”释义·····	(13)
三、主要人物表·····	(15)
四、内容简介·····	(18)
五、提要、分析·····	(23)
六、主要人物简析·····	(99)
于连·索黑尔·····	(99)
德·瑞那夫人·····	(101)
德·瑞那先生·····	(103)
玛特儿·德·拉·木尔小姐·····	(104)
德·拉·木尔侯爵·····	(106)
哇列诺·····	(107)
七、写作特点·····	(109)
八、参考阅读书目·····	(114)
九、思考题·····	(115)

一、斯丹达尔的生平、创作、思想

斯丹达尔原名亨利·贝尔（Henri Beyle）。这位十九世纪法国的伟大作家为避开当时反动统治者的耳目，一生在作品和书信中曾用过一百多个假名，“斯丹达尔”是他最后选定的笔名。

斯丹达尔一七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生于法国东南部小城格勒诺布尔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切鲁宾·贝尔是开业律师，他信奉天主教，是个极端保皇分子，敌视法国大革命，思想狭隘保守，为人冷漠无情。斯丹达尔曾这样说及他的父亲：“此人毫无可爱之处，一心只想着地产买卖”。斯丹达尔七岁丧母，幼年在耶苏会神父指导下受教育。神父的专横伪善，更使他产生了和家庭的对立情绪。他说：“我憎恨神父，也憎恨父亲，因为是他给神父以权力。我更憎恨宗教，因为他们正是以宗教的名义专横地对待我”。斯丹达尔火一样的反叛性格（他曾宣称自己是一个雅各宾党或自由主义者）和无神论思想，无疑和他年幼时的家庭生活有密切关系。

斯丹达尔憎恶父亲，却深深爱着母亲。母亲昂丽·爱特·加尼翁祖先是迁居到法国的意大利人。她开明、温和、愉快，充满爱心。她的早逝更使斯丹达尔把对她的记忆理想化了。由于母亲的血统，斯丹达尔一生对意大利怀有特殊的感情。

小斯丹达尔唯一敬爱的亲人和真正的教师是他的外祖父

加尼翁医生。这是一个“会用心跟孩子说话”的慈祥长者。斯丹达尔称他为“我真正的父亲”，“我的知心朋友”，他说：“实际上我完全是由我那可敬爱的外祖父亨利·加尼翁把我抚养成人的”。加尼翁信仰启蒙主义，曾专程去费尔奈拜会过伏尔泰，并将伏尔泰的半身雕像长年置于案头。他哺育了小斯丹达尔的启蒙思想，并给了他知识上的准备。

斯丹达尔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九年在格勒诺布尔中心学校学习。这类学校是大革命时期的产物，目的是培养为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服务的人才，教师多为革新派。斯丹达尔在校期间，数学和艺术成绩优异，毕业时获数学一等奖，他说：“我对数学的热情也许是以我对虚伪的厌恶为其主要基础，据我认为数学中不可能存在虚伪。”正是这种求实精神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并对形成他严谨精确的现实主义风格有一定影响。

一七九九年，斯丹达尔怀着寻求冒险生涯和建立功业的向往到了巴黎，投身军界。一八〇〇年随拿破仑远征军到意大利，目睹拿破仑“唤醒了这沉睡的民族”，并受到意大利辉煌的文艺成就的熏陶。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国家。

一八〇二年，由于健康缘故，斯丹达尔从军队退役，回到巴黎，潜心读书，准备从事写作。从一八〇二到一八〇六年，他阅读了大量哲学、历史和文学著作。十八世纪唯物论奠定了他对社会和对人的基本哲学观点，莎士比亚的作品则有助于他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形成。这一时期他构思了许多剧本和诗歌的创作提纲，立志成为一个戏剧作家，而终未能成功。

一八〇六年，斯丹达尔借助一个在拿破仑手下任军事要

职的亲戚，重返军队，跟随拿破仑进驻柏林。一八〇七年至一八一一年，他在帝国的行政机构中，历任皇室领地总管、军事委员会专员、皇家器物总监等职。一八一二年随拿破仑参加对俄战争，并经历了莫斯科大溃退。在战争中，斯丹达尔表现得勇敢坚定，据郎松《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记述，即使在军队完全败退的惨痛的日子里，他仍然“十分镇定，没有丧失过对事变进行分析的热情，他似乎不相信拿破仑会失败。”一八一三年，斯丹达尔被派往德国，参加拿破仑抗击欧洲君主国第六次反法联盟战争。一八一四年回到故乡，担任元老院议员副手，负责组织国民自卫。同年四月，拿破仑被迫逊位，斯丹达尔的军人生涯随之结束。他说：“一八一四年四月我和拿破仑一道下台了。”波旁王朝复辟后，他认识到：“象我这样一个到过莫斯科的人，在波旁王朝的法国除了受屈辱外，不会再有别的。”于是离开巴黎，前往直意大利米兰。

旅居米兰的七年，成为斯丹达尔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他曾说“米兰就象我的祖国”，并一直以“米兰人”自居。他不仅为意大利的音乐绘画所陶醉，而且认为意大利人重感情，精力充沛，富于活力，认为意大利比起拿破仑之后的平庸无聊的法国，更有利于人的精神的发展。他的创作内容也经常涉及意大利主题。斯丹达尔在意大利和烧炭党的某些成员有过秘密交往。并参加了和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密切相关的浪漫主义运动。

一八一五年，斯丹达尔在米兰写了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海顿·莫扎特和梅达斯泰斯的生平》。一八一七年出版了《意大利绘画史》和《罗马、拿不勒斯、佛罗伦萨》。在

《罗马、拿不勒斯、佛罗伦萨》这部游记上，他第一次署名“斯丹达尔”。

一八二一年，意大利烧炭党组织起义失败。在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具有自由主义政治信仰的斯丹达尔被迫离开米兰回到巴黎。由于经济拮据，他长期过着清贫艰难的生活。

一八二二年，斯丹达尔根据自己和一个意大利姑娘失败的恋爱，写了专题论文《论爱情》，文中分析了他自己在恋爱过程中观察到、体验到的爱情的作用和过程以及民族性对于爱情的影响。

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五年，斯丹达尔发表了他最重要的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的一、二部分，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拉辛还是莎士比亚”，即“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的问题。明确指出“我们不需要为宫廷而创作的文学，而是需要为人民而创作的文学”。提出了“摒弃‘三一律’”，

“运用民族的题材”，“用散文写戏剧”等主张。他强调向莎士比亚学习，用活泼创新的形式表现生动的现实，强调艺术对现实的真实描写，阐述了“要描写处在社会关系中人物性格的形成过程”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

一八二七年，四十四岁的斯丹达尔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一八二七年巴黎沙龙的几个场景》。这部作品以一八二五年查理十世颁布“赔偿法”为背景，写贵族青年奥克塔夫和他的表妹阿尔芒斯的爱情故事。“赔偿法”的颁布，使奥克塔夫成了一笔巨额财产的继承人，这个积极追求生活，热情磅礴的年青人，对贵族社会的虚伪、冷酷、腐朽感到十分厌倦。他爱上了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

阿尔芒斯。他们的爱情为阿尔芒斯的姑母所不满，最后，被企图霸占奥克塔夫财产的舅父，保王分子苏比朗设计破坏。奥克塔夫只得以自杀解脱痛苦，阿尔芒斯则进了修道院。奥克塔夫是第一个和复辟社会格格不入的“斯丹达尔式的英雄”，小说中所写的对个人幸福的寻求是作家在以后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由于作家把笔墨过多地化费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上，相比之下，对主人公所猛烈抨击的那个特权社会却缺乏深入细致的描绘，小说问世后，没能引起广泛的注意。

《阿尔芒斯》的失败，使斯丹达尔暂时放弃小说，转向游记写作。一八二九年，他利用早年的旅行札记和一位堂兄提供的有关笔记作为素材，写了《罗马漫步》。书中再次体现了他在审美中的相对观念，认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美的观念。

斯丹达尔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红与黑》写于一八二九年，出版于一八三一年。这部作品进一步摒弃了风行一时的司各特的以中世纪冒险传奇为题材的创作风格，也摆脱了当时为波旁王朝歌功颂德的古典主义文学的陈规。采用了现实主义方法，塑造出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于连。如实地描写了这个有美好的禀性和才干的平民青年，由于不甘心随波逐流，虚度年华，如何在充满敌意的王政复辟的环境里反抗、挣扎、浮沉，在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两军对垒，殊死搏斗的情势下，终于被轧得粉碎。通过于连的一生，作品展示出法国王政复辟后期，从外省到巴黎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表现了那个时代平民阶级的反抗意识，作品主人公于连就是作家本人的影子，作家对社会的描绘也就是对它的战斗。《红与黑》把社会性、政治性和人物的心理分析融合在一起，构成

为一个艺术整体，这是《阿尔芒斯》所不及的。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以后，斯丹达尔被任命为法国驻意大利的里雅斯特领事。奥地利当局却对这位领事的任命不予认可。一八三一年，他改任驻罗马教皇管辖下的滨海小城西维达——维基雅领事。一八三〇至一八三六年间，他写了自传性小说《自我中心的回忆》、《亨利·勃吕拉的一生》和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均在他死后出版问世。两部自传性小说叙述了他在格勒诺布尔的生活和心路历程，作了坦白、真诚、严格的自我剖析，对了解斯丹达尔的青少年时期很有帮助。《吕西安·娄万》是反映七月王朝时期的长篇小说，它以大银行家之子吕西安在军界、政界的经历为线索，反映了路易·菲利浦当政时期，在金融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社会现实，突出地反映了政府的营私舞弊，贪污腐化；劳动人民被压榨被剥削的苦难生活以及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主人公吕西安和于连一样，不停地在寻求自我和个人的幸福，但缺乏于连那样的热情和活力，经常处于被动，对周围的现实仅是给予冷漠的嘲弄。从人物塑造看，不如《红与黑》生动丰满。

《吕西安·娄万》未及脱稿，斯丹达尔的写作又转向自传性文学《拿破仑生平》（一八三〇年）和中篇小说《卡司特庐女修道院院长》（一八三九年），这个中篇连同一八二九年以后陆续发表的其它几个中短篇（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尼娜·法尼尼》），在作家去世后合集出版，题名《意大利遗事》，因为它们都是根据意大利的传说改写而成。这些作品都具有反封建反教会的反抗精神，并充分写出了作家所喜爱的“意大利的热情性格”和对“力”的崇拜，用以对照法国社会由

于资本主义利害关系而失去了自然感情的苍白卑怯的人物。这一时期他还写了《一个旅游者的见闻录》(一八三九年)，记叙了法国外省生活，对它的风俗人情诸多讽刺。

在一八三九年的最后两个月里，斯丹达尔以口述方式完成了他第二部杰作小说《巴玛修道院》，该书情节大体取自意大利手抄本《法尔耐斯望族创业史》。作家借用十五世纪罗马贵族青年法尔耐斯的故事，注入新的内容。把故事背景放在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战争之后的一个意大利小公国巴玛。通过主人公法布耐斯·台尔·唐戈学习拿破仑，参加祖国解放斗争的冒险故事和爱情生活方面的纠葛，反映出反动的神圣同盟时期欧洲的政治风云、社会动态以及它所引起的家庭变故、个人命运的变化。出身贵族的法布耐斯是又一个“斯丹达尔式的英雄”，他性格古怪，才华过人，向往自由、幸福，仰慕拿破仑的伟大业绩，曾追随1915年重新登上王位的拿破仑向欧洲的封建武装作战。但在封建小王朝险恶的政治环境里，他几经坎坷，最后当了巴玛大主教。又由于他和情人克莱莉亚的孩子夭折，克莱莉亚悲痛而死，他辞去了主教职务，退隐到巴玛修道院。原本一心要轰轰烈烈干一番英雄事业的法布耐斯不得已按照本阶级的要求走上为教会服务的道路，在抑郁中度过残年。这和于连一样，也是时代的悲剧。这部小说出版后受到当时已负盛名的巴尔扎克的高度赞扬，为它写了一篇长达七十二页的专论《贝尔先生研究》，并在给友人的信中称它为“五十年来最美的书”。

《巴玛修道院》是斯丹达尔生前唯一获得成功的著作。

一八三九年十月，斯丹达尔动笔写长篇小说《拉米埃》，未及完卷。

斯丹达尔于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巴黎街头中风去世。遗体被安葬在蒙马特尔公墓。墓碑按照他生前遗嘱用意大利文刻着：“米兰人。活过，写过，爱过。并崇拜齐马洛萨、莫扎特和莎士比亚。”

斯丹达尔生前文名寂寞。《红与黑》未能引起反响，《巴玛修道院》只得到巴尔扎克的赏识。其它重要作品如《吕西安·娄万》等则是在他去世多年以后，根据遗稿整理出来的。尽管受到同时代人的冷遇，斯丹达尔却始终没有放下手里的笔，而且对自己的创作满怀信心。他说：“我想，五十年后某一文学补缀家发表拙作的一些片断，也许会以不矫揉造作和真实而为人悦读吧。”历史毕竟是公正的，作为一个法国复辟时代的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斯丹达尔终于被广大人民所承认，他的作品受到高度评价，被列入世界文学宝库之中。

斯丹达尔生活在法国资本主义战胜封建制度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他一生经历了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一七九九至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帝政，一八一五年波旁王朝复辟，一八三〇年法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和七月王朝的建立。时代滋养了他的思想和著作。他本人的命运也和大革命、拿破仑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他始终站在进步的方面。

斯丹达尔的哲学思想属于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他重视理性、人权，歌颂自由、平等、民主。他把人人都追求幸福作为生活的法则，认为在个人利益里也就包含着公共利益。他

是无神论者，他说：“我们原谅上帝就是因为他根本不存在”。他大胆揭露宗教的虚伪，并认为“罗马天主教是一切罪恶的源泉”。

斯丹达尔的政治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贵族、国王三位一体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主张依靠贤明的统治者和完善的法制缔造“合理的社会”。他衷心崇拜拿破仑的反封建勇气和爱国精神。他说过：“我只尊敬一个人，就是拿破仑”。称拿破仑是“革命的儿子”，称拿破仑时代是“生气蓬勃的运动的英雄时代”，尽管对拿破仑后期的独裁军事统治和他对封建势力的妥协深感失望，但在王政复辟时期，他仍深切地怀念着拿破仑，一再企图通过文学作品重现拿破仑的形象。

斯丹达尔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他提出“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表现他们时代的真实东西，因此感动他们同时代的人”。他这里所说的浪漫主义其实是指现实主义的反对因袭、保守，摆脱传统的轨道的基本精神。并且提出“要描写处在社会关系中人物性格的形成过程”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在创作实践上，他力求按照客观实际，批判地去塑造典型，深入挖掘和生动地描绘出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对小说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法国文学开拓了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二、关于《红与黑》

《红与黑》是斯丹达尔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西欧批判现实主义的一块奠基石。尽管在斯丹达尔生前“现实主义”一词尚未出现，但是在今天谈到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的发展，必然要上溯到《红与黑》。

1. 历史背景

一八三一年《红与黑》初版时的副标题是“十九世纪记事”，后改为“一八三〇年纪事。”斯丹达尔在《论〈红与黑〉》一文中又明确指出，“他的这部作品是描写一八一四至一八三〇的波旁王朝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严肃的，尊重道德的，愁眉苦脸的法国”，是要“认真描写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由此可见，作家是把《红与黑》作为十九世纪法国历史来写的。

故事从一八二五年前后开始，在七月革命前夕终结。这一阶段正是法国历史上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最后一次严重较量的时期。法国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政体，摧毁了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拿破仑帝国巩固了革命成果。一八一二年拿破仑远征俄罗斯大败而归，欧洲各君主国联军节节取胜，步步进逼，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攻入巴黎，四月六日拿破仑宣布逊位，五月三日路易十八在教堂钟声和礼炮声中进入巴黎。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拿破仑从地中海的厄尔巴岛

潜回法国，从法国南部一个小港登陆，仅二十天即抵达巴黎。路易十八仓皇出逃。英法大军在滑铁卢决战，拿破仑战败被俘，被押往大西洋的圣海仑岛。法国王政第二次复辟。王政复辟是历史的倒退。当时法国国土上驻扎着十多万英、俄、普等国占领军，路易十八推行的是贵族、僧侣、大资产阶级三位一体的联合政权。他们“对旧的什么也没有忘记，对新的什么也没有学会”，大肆反攻倒算，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法国大革命失败后，“在波旁王朝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主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这一贵族社会在一八一五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竖起了陈旧的法国生活方式的旗号”（《致哈克奈斯的信》），它不仅和广大劳动群众处于极端对立的地位，而且也侵犯了中小资产阶级利益，剥夺了他们从大革命中争得的“自由、平等、博爱”权利。复辟政府设立军事法庭和特别法庭，逮捕审讯革命分子。据史料记载，复辟不到一年，就有七万人被判处死刑、徒刑和流放。但是，经过资产阶级政权连续统治二十五年之后，法国资本主义已经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已经拥有相当实力。路易十八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如容忍君主立宪政体，保留一定数量的拿破仑时期的官员和军官，容许资产阶级政党存在和进行活动等。

一八二四年路易十八去世，其弟阿多瓦伯爵继承王位，称查理十世。这个滥用专制权力的暴君执行更为反动的政策。一八二五年颁布赔偿法，从国库拨款十亿法郎补偿贵族、僧侣，这一数目相当一七九〇被没收土地收益的二十倍。为筹措这笔巨款，政府把公债利息由5%降到3%，严重触犯了资产阶级利益，反对派大叫“抢劫国民”。劳动人民生活情况

的恶化更可想见。查理十世极力加强天主教对人民的统治，颁布反宗教治罪法，恢复教会特权。由天主教中最反动的秘密组织耶苏会教士掌握教育、警察等大权，并有大量耶苏会教士渗透到社会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充当宗教和政治密探。教派斗争，耶苏会和贵族之间的斗争也十分激烈。一八二〇年又颁布出版法，把所有报刊置于严格的检查制度和司法追究之下。一八三〇年五月，取消了路易十八在宪法中所保证的立宪自由，宣布解散议会。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受过大革命影响的各阶层人民的激烈反抗。一八三〇年七月，由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首先发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集会和示威游行，巴黎工人区也自发举行武装起义，查理十世逃亡英国。七月革命结束了波旁王朝。革命胜利果实被大资产阶级窃取，拥立王室旁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继承王位，称七月王朝。（一八三〇——一八四八）法国政权由地主贵族阶级转到大资产阶级即金融资产阶级手中。

《红与黑》从各个角度反映了王政复辟后期法国政治生活的整体和细节，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方面。书中主人公于连是平民出身的知识青年。当时法国平民阶级和反动僧侣、封建贵族、大资产阶级处于矛盾对立的地位，具有反封建思想，但又有妥协的一面。具体到个人身上，随着身世、经历、文化教养等方面的差异，或有较坚决的反抗性，或有较明显的妥协性。这种两重性真实而具体地反映在于连身上，而且不断地发展变化着，构成了这一艺术形象的复杂性。

2. 从素材到作品

《红与黑》取材于当时法国地方报纸上的两则新闻。一

则是居住在巴叶尔德比戈尔镇的制造高级木器的工匠阿德里安·拉法尔格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太雷兹·隆康。这个轻浮的女人不但不加拒绝，反而有意挑逗，但不久就对拉法尔格感到厌倦。拉法尔格决意报复，连发两枪，打死了她，还割下她的头。一八二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拉法尔格被送上比利牛斯省的重罪法庭，法庭认定他有可以酌情减刑的情节，判五年监禁。另一则是：伊泽尔省北部布朗格村的一个马蹄铁匠的儿子贝尔特由于身体瘦弱和智慧过人，早年被送进神学院学习，因患病中断了学业，本地一个姓米舒的乡绅聘他做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不久即因他和米舒太太关系暧昧的传闻而被解聘。之后，贝尔特到米舒的邻居科尔东家任教。又有人说他和科尔东小姐有私，再次失去职位。从此，各处的大门都对他关闭了。这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的年青人认定是米舒太太有意陷害，在绝望的冲动下，走进教堂对她连发两枪，后被伊泽尔重罪法庭判处死刑，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执行。斯丹达尔以这两件刑事案为素材，联系复辟社会的政治背景，运用自己的生活积累，并融进他对于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认识，进行艺术构思和形像塑造，写了《红与黑》这样一部富有浓郁政治色彩的，反映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悲剧。高尔基赞扬说：“斯丹达尔凭着自己的才能，把一个极为平常的刑事犯罪案件提高到对十九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的哲学的分析的高度。”（维诺格拉多夫的《时代的三色》一书序言）

3.“红”与“黑”释义

在一八二八年斯丹达尔开始动笔写这部作品时取名《于

连》，一八二九年完稿付印时改名为《红与黑》。这个标题象哑谜一样引起过许多猜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斯丹达尔曾在《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的稿纸上写过一句话：“《红与白》为了唤起《红与黑》的记忆，也为了提供读者们一些报道材料，红：共和党，吕西安；白，保王党，少妇沙斯特莱”。此外，斯丹达尔还曾说过：“如果早一个时代出生，于连可能是一个兵，可是他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就不得不披上教士的法衣，黑色就是这样来的”。据此，可以推知，“红”代表充满英雄业绩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黑”象征教会势力猖獗的复辟时期。于连生逢两个时期交替之际，从向往拿破仑的红军装到穿上教士的黑道袍，走完了他悲剧性的人生道路。“红”与“黑”也可以理解为一系列对立的范畴，红：勇敢、荣誉、幸福、成功、爱情；黑：虚伪、野心、罪恶、毁灭，于连的形象正是在这一系列的矛盾中完成的。书名的含义和作品的主题一样，深刻而宽泛。